

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

孟子與子思、曾子關係考論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計畫編號：NSC93-2411-H-002-079-

執行期間：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

執行單位：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

計畫主持人：葉國良

報告類型：精簡報告

處理方式：本計畫可公開查詢

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6 日

## 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學術關係考論

台灣大學中文系·葉國良  
(未定稿，僅是大意，請勿引用)

宋人提出的儒學「道統說」，關涉到什麼才是儒學主流學說的認定，自然是極具有排它性和可以爭議的命題。本研究不涉及先秦以下的討論，而僅討論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這個譜系是否可以成立。其中，曾子是孔子晚年的學生，子思是孔子的孫子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，彼此存在一定的關係，這是無法否定的事實（儘管宋代晁說之、王柏試圖強調曾子、子思的傳承關係，而否定或削弱子思、孟子的關係，詳參拙文〈先秦古禮書研究之反思——以晁說之《中庸傳》之寫作動機與影響為例〉，收入拙著《經學側論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真正需要細緻地探討的是：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三者的學術關係究竟有多大，是否其它儒門的傳承都無法取代？如果是，那麼即使三者的學術存在若干差異已是讀過先秦古籍的學者的共識，此一譜系仍然可以成立。因此，就本研究而言，揭櫫三者的關係乃是主要的工作。

本文的討論，主要的典籍依據是《論語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大戴禮記》、《孝經》和《孟子》。因為曾子的言論見於《論語》和二戴《禮記》中的曾子諸篇（孔廣森以《禮記》〈曾子問〉加〈王言〉和《大戴禮》曾子十篇合為《曾子十二篇讀本》，依朱子的意見，還可以加入〈大學〉，依武內義雄的意見，也包括《孝經》），子思的言論見於《禮記》〈中庸〉、〈緇衣〉、〈表記〉、〈坊記〉和已融入《淮南子·繆稱》的〈累德〉以及散見於〈檀弓〉等篇的零星資料，孟子的言論則有《孟子》一書。至於新出土的戰國西漢儒家簡帛，特別是郭店簡，由於學者已提出其中多「思孟學派」之言，自然也需要納入討論的範疇。需要聲明的是，本文雖言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三者，其實是指其學派，因為上舉文獻，不必是其親撰，也有後世加入若干章句的可能，讀者勿泥於字面可也。

筆者認為要討論這個問題，最好的方式是從《孟子》一書入手，因為孟子是這個譜系的最後一人，他的言論最能透露此一問題的消息。第一個方法是看看孟子引述前人言論的情形。檢查《孟子》一書，凡引（論）古人或時人之言之事，以孔子超過四十次為最多，孟子自言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」，這自在意料之中。而在七十子當中，則以引曾子言、論曾子事約七八次為最多，其他如顏淵、子路、子貢則僅各二三次，更重要的是孟子對七十子大多各有褒貶，如公孫丑問：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則具體而微。敢問所安。」曰：「姑舍是。」朱注：「孟子言且置是者，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。」在〈盡心下〉，孟子說：「如琴張（子張）、曾皙（曾子父）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」因為「其志嚶嚶然，曰：『古之，古之人。』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」易言之，儘管公孫丑所問之諸人各有長處，但並非孟子心中最理想的典範。然而孟子對曾子則無一貶辭。在〈滕文公上〉，論子夏、子游、子張欲事有若之

事時，特別推崇曾子，〈公孫丑下〉論曾子之勇勝過子夏與孟施舍，〈離婁上〉又贊美「事親若曾子者，可也」，可見孟子曾子推崇備至。至於引子思之言及論子思之事，次數也超過七十子之徒或其第二代如曾元、曾西（曾子子）、申詳（子張子）等人，主要是推崇子思知禮及不屈於權貴、敢對王者抗禮為師的氣節，〈萬章下〉載：「（魯）繆公亟見於子思，曰：『古千乘之國以友士，何如？』子思不悅，曰：『古之人有言：曰事之云乎，豈曰友之云乎？』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『以位，則子，君也；我，臣也。何敢與君友也？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，奚可以與我友？』千乘之君求與之友，而不可得也，而況可召與？」這讓人想起孟子「說大人則藐之」的氣勢和對待齊、魯等國國君的作風。（公孫丑下）言及子思、泄柳、申詳（子張子）時，說：「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，則不能安子思；泄柳、申詳，無人乎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」兩相比較之下，孟子對子思的推崇便無可置疑。〈離婁下〉說「曾子、子思同道」，確實，曾子和子思在《孟子》書中談論既多，又只有稱道而沒有貶語。如把上述者串連起來，《孟子》一書所見者，似可為支持宋人道統說之一助。

除此之外，我們還可從學風加以觀察。即三者引用《詩》、《書》明顯的比先秦其它著作為多，並且內容多談禮儀。我們仍然從孟子起倒過來看。《孟子》一書，明（暗）引《詩》論《詩》多達三十餘次，而與之交言者引《詩》亦有五次。明（暗）引《書》論《書》多達二十次以上，引禮書或論禮亦有五六次。這和孔門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」之教是相符的。子思的著作中，〈中庸〉、〈緇衣〉、〈表記〉、〈坊記〉都大量引用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和《禮記》其他各篇有明顯的差異。〈坊記〉引《詩》十三次，《書》四次；〈中庸〉引《詩》十六次，〈緇衣〉引《詩》二十四次，引《書》十四次；〈表記〉引《詩》十八次，引《書》三次。至於《曾子》諸篇，引《詩》三次，〈大學〉則引詩十次，此外，《孝經》引《詩》十次，引《書》一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三人引《詩》都以《雅》佔絕對多數，這應不是巧合，而應理解為與學風有關。以上從某個側面說明了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在學風上有傳承關係，特別是子思與孟子引《詩》、《書》的作風更為相似，晁說之、王柏試圖疏離子思與孟子的關係，在這一點上無法圓滿。

但以上的討論，仍未觸及思想史家關心的「思想」方面的問題，自然還不算具有說服力。本文也必須處理「思想」問題，但可以將重點放在曾子、子思的關係上，因為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，又被大儒荀子合稱，大陸學者將傳統的二人著作及若干郭店儒簡稱為「思孟學派」的著作，筆者認為可以接受而不圓滿。第一，宋人的道統說是將「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」列為一系的，今人不欲討論此一命題則已，若欲討論，則須證成之，或予以全部或部分否認，若只講「思孟」而置上半截不論，對原有的思想史命題的討論便不完整了。第二，韓愈、程子、呂大臨以至朱熹逐漸形成的道統說，在曾子、子思關係上的論證顯得相當薄弱，因為自文獻學之角度加以考察，有一大缺陷，即呂大臨謂〈中庸〉是孔子傳之曾子、曾子傳之子思而形成（詳衛湜《禮記集說》），及朱熹《大學章句》中「右經一

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」之言，都缺乏直接的記載，而曾子、子思是否有師承關係，文獻也沒有有力證明。所以證實曾子、子思在思想上的關係，實為維護其道統說之所必須。證實之道，厥為在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〉之外，闡明屬於曾子、子思（或其學派）所作之篇章在思想上確有傳承關係。自南北宋之交的晁說之起，包括清人邵懿辰等，已提出彌縫的可能性，學界自然不能置之不理。

晁說之就〈曾子〉諸篇與〈中庸〉所用之文詞相同及反映之思想有關處，論證曾子、子思之關係，其目的雖在揚曾貶孟，而就實質論，則可為道統說之一助。邵晉涵亦有見於此，嘗於〈與朱笥河學士書〉中表示，欲從《禮記》中摘出〈中庸〉、〈表記〉、〈坊記〉、〈緇衣〉四篇，合《大戴禮記》中之〈曾子〉十篇，及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名曰《四書》，而為之注，以配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「實謂四子」。即因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關於曾子、子思之學份量過於單薄。自郭店楚簡儒家著作出，學者多以為該等篇章屬於子思學派，遂取與《禮記》〈中庸〉、〈緇衣〉、〈表記〉、〈坊記〉諸篇相印證。拙文〈郭店儒家著作的學術譜系問題〉（收入拙著《經學側論》，清華大學出版社），則認為單單如此處理還不夠，而主張該批資料可視為曾子、子思一系之學（因為郭店簡的時代可能孟學還沒出現或成熟），因為從文詞和思想上可與《禮記》〈中庸〉諸篇及《大戴禮》〈曾子〉諸篇互證，茲不復贅。

個人認為晁說之之說有理，他指出〈中庸〉和《大戴禮》中〈曾子〉十篇在內容、用詞上的傳承關係。如〈中庸〉云：「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」而〈曾子立事〉說：「己雖不能，亦不以援人。」〈曾子本孝〉說：「孝子之事親也，居易以俟命，不興險行以徼幸。」不僅二者內容相同，用詞也極一致。又如〈中庸〉云：「故至誠無息，不息則久，久則徵，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博厚所以載物也，高明所以覆物也，悠久所以成物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」而〈曾子疾病〉說：「君子尊其聞則高明矣，行其所聞則廣大矣。高明廣大，不在于他，在加之至而已矣。」這些例證便內在的證實了呂大臨的提法。除了晁說之的論證外，我們還可以從別的文獻上的比對加以說明，《孝經·廣至德章》云：「《詩》云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非至德，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！」而〈表記〉云：「《詩》云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……非至德，其孰能如此乎！」和上文所舉用語極其酷肖，應非偶然。

有一個層面我們必須討論，即曾子學說可以和子思、孟子有所異同，子思和孟子也可以有所異同，而最重要的是看它們是否有大的矛盾，如果沒有，便不必先否認三者之間的關係。如〈曾子立孝〉言仁、義、忠、信、禮，簡帛〈五行〉篇所反映的仁、義、禮、智、聖，有「忠」和「聖」的不同，但這不能理解為曾

子和子思（或許包含孟子，但到目前為止，尚無明證）的矛盾，反而可暗示二者的關連。又如〈曾子立事〉說「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」，這和孟子的性善說在思想上是契合的。總之，在可以認爲屬於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一系之學的著作中，我們其實看不到思想上的重大衝突。再換另一個角度，從現存著作看，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子是孔門後學著作留存量最多的學者，其它的流派，由於大多無法確知其著作之篇名，而現存著作的數量也無法顯示某數篇能反映出某種較特殊的體系，因而說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代表「道統」，其實不易反駁。至於荀子，由於思想體系的差異，對子思、孟子也有嚴厲而根本性的批判，因而道統譜系自然需將荀子排除在外。

所以，「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」是聖聖相傳的提法，根據傳統圖書及出土文獻整體來看，可以成立的證據遠多於不能成立的論證。只是此一道統說，對研究四者思想體系的細微演變上究竟有多大價值，是可以進一步探究的。